



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

田玉隆 田泽 胡冬梅/等著

丛书主编: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贵州土司史

GUIZHOUTUSISHI

下册

GUIZHOUTUSISHI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理名著丛书

中国历史地理名著丛书

贵州土司史

中国历史地理名著丛书

下册

中国历史地理名著丛书



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

田玉隆 田泽 胡冬梅/等著

丛书主编: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贵州土司史

G U I Z H O U T U S I S H I

下册

ISBN 7-221-08211-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州土司史/田玉隆等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4
ISBN 7-221-07344-9

I. 贵… II. 田… III. 土司制度—历史—研究—
贵州省 IV. D6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9945 号

贵州土司史(上、下)

田玉隆 田 泽 胡冬梅 等著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封面设计	熊 锋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9×1194mm
开 本	32 开
印 张	25.75
字 数	59 万字
版 别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1-07344-9/D·427 定价 50.00 元

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王良范 李建军
副 主 编:徐之明 吉志义 辛 维
编辑委员会:王良范 李建军 徐之明
 吉志义 辛 维 罗晓明
 罗宏伟

目 录

下册

第四章 土司社会的农民斗争	471
第一节 元朝贵州农奴斗争	476
一 元初农奴斗争.....	478
二 宋隆济和蛇节领导各族斗争.....	481
三 元中叶农奴的零星斗争.....	487
四 云贵川交界各族和蒙古军的 反元斗争.....	491
第二节 明朝贵州各族斗争	497
一 洪武年间贵州各族斗争.....	499
二 腊尔山区“苗人”反明斗争.....	507
三 各族反卫所侵占田地的斗争.....	522
四 川黔交界农民反抗土官和明王朝斗争.....	540
五 杨应龙为首的反明斗争.....	541
六 皮林地区农民反明斗争.....	556
七 安邦彦和宋万化为首的反明斗争.....	558

第三节	雍正年间贵州各族反清斗争	581
一	长寨广顺等地苗布民族反抗清军侵 占田地斗争	583
二	古州清江八寨等地反清斗争	592
第五章	改土归流	605
第一节	改土归流	608
一	改土归流的原因	608
二	贵州改土归流比其它省区早	612
三	改土归流的政策	615
第二节	改土归流的进步性	629
一	解放农奴等民众	630
二	废除土官称雄割据	632
三	省府州县建立的作用	633
四	儒学在土司地区兴起	640
五	地主经济迅速发展	643
六	废除土司时代的此疆彼界促进各少数 民族汉化成汉族	648
第三节	各族对改土归流的态度	665
一	土官和民众拥护改土归流	665
二	开“苗疆”	666
三	土官利用民众反抗改土归流	668
第四节	改土归流不彻底	682
一	改土归流不彻底的原因	683
二	贵州残存土官群	684
三	改土归流前后的土官大有区别	685

第六章 田杨安宋等大土官对贵州历史贡献..... 689

第一节 田杨安宋等大土官 689

一 安宋二氏所建宣慰司 694

二 安氏族属 699

三 宋氏族属 701

四 田氏所建宣慰司及其族属 710

五 杨氏所建宣慰司及其族属 717

第二节 田杨安宋等大土官在贵州历史上
的作用 733

后 记 742

附件:

1. 中国历史年表 748

2. 思州田氏元代官制表 789

3. 独山蒙氏官制表 790

4. 安龙贞丰罗甸等地布依族官制表 791

5. 水西彝族官制表 792

6. 田谨贤及诸子、孙世官表 793

第四章

土司社会的农民斗争

贵州领主经济的发展,使贵州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可是,享受繁荣果实的不是苗汉等各族民众,而是中央王朝的各级流土官吏,人民照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贵州各族过去主要受土官为首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剥削,元以后又加上皇帝和流官的压迫与剥削。民众的负担超过了力所能及的限度,惟一的办法只有走上反抗的道路,即官逼民反,举行武装起义,以求改变目前的痛苦处境,这是元明清贵州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其次是各土官之间兼并仇杀,如水西、乌撒、镇雄的彝族土官为争地、争印、争袭仇杀长达数十年,在贵州历史上是件大事;其三是各族在其统治阶级率领下,彼此仇杀,如彝族先民在“苴穆”率领下打败安顺等贵州西部地区的仡佬族而有其地,“苴穆”又率彝族先民越过鸭池入贵阳与苗族激战,壮族土官岑黄等氏率布依族先民越过盘江攻陷达安、和宏等州而占领之。元明清,各族的这种斗争往往是由中央王朝主使,即史书说的“以蛮夷治蛮夷”,“以苗治苗”等反动措施。又如湘黔川边区,自称为“盘瓠蛮”“大首领”的田冉李向邓雷等大姓,统率其部众向不崇拜“盘瓠文化”的“板楮蛮”等民众进行讨伐,迫使他们或离开此区,或屈服,故诸史籍把此区民众记作“盘瓠蛮”了。元明

清贵州阶级斗争极为复杂,上述斗争此时此地是交错进行,彼时彼地又分开进行。我们在此主要研究贵州各族联合反抗中央王朝及地方政权中流土官吏的斗争,这个斗争是贵州历史上主要阶级斗争方式,贯穿整个土司社会,予各族影响也最大。其他方面的斗争从略。

贵州土司社会的战争性质极为复杂,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探索出战争的性质,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指导社会前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和反对非正义战争。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我们在研究贵州土司时代的战争时,发现只有农奴等被压迫民众反抗封建王朝压迫剥削战争是正义的,以封建王朝为首残酷镇压农奴等民众战争是非正义的,这两种战争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贯穿整个土司时代。

研究土司时代的阶级斗争,我们认为这几个特点很是值得注意:

第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要推翻旧政权,建立起义者新政权,最重要措施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普遍地大规模地举行武装起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旧政权,使整个统治阶级惊慌失措,旧的国家机器应接不暇,逐步以至最后完全陷入瘫痪,从而完全失去指挥镇压能力。与此同时,起义者要有卓越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的领导者为领袖,高瞻远瞩地组织领导起义,建立起坚强领导核心,建立巩固根据地,迅速建立起起义者的新政权,有效地解决给养和增援力量,并且要制定出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并代表起义者利益的方针政策,积极组织 and 率领广大受苦阶层民众为推翻旧政权和巩固扩大新政权而斗争,要最大限度地孤立瓦解敌人,为夺取完全彻底胜利而打下政治、经

济和军事基础。但是，贵州各族农奴等人在土司时代的起义都不具备上述条件，元明清贵州虽有无数次各族起义，“有众数万”至“数十万”，多则坚持数十年，少则几个月，最后都被中央王朝联合各族土官镇压下去了。

第二，土司时代，贵州各族农奴等人都分散在各个土官等封建领主的庄园内，农奴等人特别分散，彼此平时很少或没有交往。各个土官领地内农奴等人所受压迫剥削残酷程度不等，各个领主庄园的农奴等人不可能同时发生起义。因此，特别分散的农奴等人一旦发生起义，未得到彼处农奴等人支援，就被镇压下去了，即史书说的“此起彼伏”。元代贵州农奴等人起义多属这种情况。农奴等人没有联合，整个统治阶级早已联合好了，每当一处有农奴等人起义，来不及得到其他地方农奴等人支援，就被早已联合好的统治阶级扑灭了。

第三，土司时代，贵州农奴等人起义仍沿袭羁縻制时代的老方式，即起义后多以土官等统治阶级为领袖，使领导层很复杂。这种起义方式到明永乐十二年改土归流建省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即贵州各族起义开始摆脱统治阶级控制，逐步发展成各族反压迫剥削斗争。

第四，贵州在元明时期，中央的统治既深入又巩固了，流官也侵犯了土官利益，每当农奴等人起义，本民族统治者也参加了。或者土官一呼就有农奴等人跟着反流官。这时期的农奴等人起义就有反抗民族压迫和全民参加的色彩，贵州各族统治阶级也利用本族农奴等人力量与汉族流官争权夺利。这种斗争是进步的，正如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指出，“群众从封建睡眠状态中的觉醒，他们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争取人民自主，争取民族自主的斗争，是进步的”（中央民院编《列宁论民族问题》101页）。贵州开设布、按二司后，“官吏在彼，廉洁者少，

贪墨者多，又人人索取民财，日渐穷困，以致去岁苗贼反叛，杀害军民。总兵官官聚又生事激变，水西等处，土官共起谋逆，劫杀地方（官吏），烧毁（府）卫（衙）门，驱俘（流官）人口”⁽¹⁾。故有一呼即起，男女老少都参加，很短时间内就有众数千、数万、数十万，这是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矛盾极为尖锐复杂，一触就汹涌澎湃，犹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我们研究元明清贵州阶级斗争，既要看到民族压迫，又要看到阶级压迫，归根结底是阶级压迫促使起义爆发。

第五，土司时代，贵州农奴等人起义因带有全民性，领导集团就不可能始终坚持团结，即在艰难困苦下不分裂变节投降，这是办不到的。这样，起义开始时力量如何强大，时间长久，起义范围扩大，也能形成各族初步大联合。大德五年，“宋家苗”首领宋隆济领导苗侗和彝妇蛇节领导的各族联合大起义，坚持了六年。由于统治阶级的叛变投敌，“宋家苗”宋阿重和彝族“三土官弃家来归”，使这次起义被元王朝联合各族土官镇压下失败了。

第六，土司时代，贵州土官代表中央王朝在地方统治，土官与朝廷关系是“儿子作恶娘不管，打了儿子娘出来”。土官们平时怎样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等人，中央王朝概不过问，如果农奴等人稍侵犯土官，或土官谎报农奴等人谋反，这是大逆不道，朝廷就派兵联合土官对农奴等人镇压。舒应龙《者牙善后疏》言“乐平瓮河乐户西二牌夷民乐三，因宋廷瓚科索致叛”。又“平定、乐平二司叛逆之衅，其初俱由土官科索所致，其各土官所依为爪牙羽翼者，有汉把、头目、把事、权司等项名色，皆四方投附奸宄，无籍之徒，日为土酋规画，非侵夺淫纵之事，则脔削渔猎之谋”（《江东南之《贵州通志·纪兵》）。贵州“抚臣舒应龙檄参将张奇峰讨之，斩首一百九十八级，获阿韶以下十有四人”⁽²⁾。万历十三年，黎平府属中林驢洞土官杨相科敛无度，“众怒之”，“杀相父子”，

知府王事圣和永从知县陈常“调靖、铜、五三卫三千人讨之，改娄罗砦为平罗”⁽³⁾。土司时代阶级斗争，往往是农奴等人反土官和反封建王朝同时进行，很难分出哪些斗争纯属反土官，哪些斗争纯属反封建王朝。

第七，土司时代各族起义，都自带给养，无后勤供给。田汝成《炎徼纪闻·阿向》载“窃闻之，首祸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课其十日之粮，亦不下三四十石，费亦厚矣”。若经半月一月激战，所带之粮食尽，因无人转输供应，不攻自破。元明清王朝侦知此弊，采取碉堡围剿，田氏言“夫蛮陬夷落之地，事异中原，譬之御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击无所为力。故征蛮之方略，皆广列伏候，扼险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谓之得地；若我迎其险，而彼乘其高，顺逆强弱之势已悬倍蓰，是以诸贼虽微，亦未可以蓐食屠翦也。惟在据其要害，断其刍粟之途，重营密栅勒其间，觐观严壁而居，勿与角利，彼进无所乘，退无所逸，远不过一月，而羸疲之尸，槁磔麾下也。若夫我军既固，彼势益孤，必至奔突，则溃围之战，不可不鏖也”。历观元明清史籍，贵州各族起义，多被封建王朝以此法所破。《朱批谕旨》载雍正十年九月三日高其倬奏“臣查苗人情性聚众，皆各自带粮，用十日半月之后，米粮食尽，即各散回本寨，不能久聚一处”。“当苗人初集锐气之时，稍缓击，以老之，乘其粮尽剿之”。“官兵乘其食尽散归之时，则攻剿更为易力”。

我国地大人多族众，各地各族在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的方式与内容都不尽相同。我们从贵州历史特点出发，研究了贵州在土司时代的阶级斗争，我们认为以上七点是不能忽略的。我们高度重视了这七点之后，才能予贵州各族在土司时代阶级斗争的内容与性质以科学解释。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战争是民族和

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贵州土司时代的战争，即统治阶级在镇压被统治阶级而使用，而被统治阶级也使用战争进行反抗。“战争的胜利，主要地决定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问题的。然而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封建社会的贵州，被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处于劣势，特别是在土司社会里更是如此，所以战争的结果都是以农奴等被压迫民众失败而告终。

土司时代，贵州各族起义，虽然都被统治阶级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农奴等民众起义，给贵州土官为代表领主沉重打击，许多土官在农奴等人起义冲击下灭亡了，有些衰弱了。如贵州四大土官之一的宋氏，在“苗阿朵”等人领导多次起义打击下走向衰亡⁽⁴⁾。农奴等人起义给中央王朝打击同样沉重，迫使中央王朝作点让步，迫使流官收敛一些，不敢再像起义前肆无忌惮地作恶，予贵州的进步是有益的。

第一节 元朝贵州农奴斗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三月，思播田杨“各遣使纳款”⁽⁵⁾，元朝开始在贵州建立统治秩序。十六年，“以龙方零等为小龙番等安抚使，仍以兵三千戍之”⁽⁶⁾。元朝约用三年时间，基本实现了对贵州的统治。

蒙古族统一全国前已建立封建国家，到统一全国后，其发展

水平和贵州不相上下，都是封建领主制阶段。元朝制定统治全国的措施就以这个发展水平为基础，在辽阔的疆域与众多的民族国家里，利用民族和地区的不同，被征服时间先后等因素，人为地制造牵制和隔阂，实行分化统治政策。元朝政府将全国民众分为四等：蒙古人为第一，“色目”即满、回、维吾尔等人为第二，汉人为第三，南人即南方各少数民族包括部分汉族为第四。贵州各族属第四，社会地位最低。元统治者拉拢“色目”、“汉人”、“南人”的统治者，组成联合统治。至元二七年，金竹知府扫闾言“近与赵坚招降古竹弄、古鲁花等三十余寨，乞立县，设长官、总把，参用土人，从之”⁽⁷⁾。贵州各族民众和统治者都处于当时社会的第四等，同样受一、二、三等官兵歧视与压迫，而以人民最痛苦，常被元官兵俘“为奴”。枢密院官言“有唐兀带者冒禁引军千余，于辰、沅等处劫掠新附人千余口及牛马、金银币帛等，而麻阳达鲁花赤武伯不花为之乡导”。元廷为巩固对“新附人”的统治，杀“唐兀带、武伯不花，余减死论，以所掠者还于民”⁽⁸⁾。元官兵一入贵州就实行明敲暗抢式统治，至元十七年三月，水西土官阿察阿里率彝苗反元，予元廷沉重打击，“罗氏鬼国土寇为患，思播道不通”。元“命以蒙古军”等蒙、汉、苗兵四万六千多人⁽⁹⁾，“三道并进”，用了四年的时间，由于阿察、阿里降元，反元失败⁽¹⁰⁾。

这次事件后，迫使元廷对贵州土官等作让步，改变原来排斥贵州土官参加统治策略，吸收他们为地方官。“改亦溪不薛为顺元路，以（彝官）阿察为宜抚使”⁽¹¹⁾。又“立亦溪不薛总管府，命（彝官）阿里为总管”，并“兼顺元宜抚使”。“宋家苗”宋添富为“亦溪不薛千户”⁽¹²⁾。元廷吸收贵州土官等参加统治，从此成为定制，终元之世不变。“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湘、鄂、川、黔、桂边区），以其酋长赴阙（观光，转变反元思想为

效忠元廷),定其地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镇远、古州八万蛮夷总管府等)”,以“赴阙”回来的“酋长”为府州县长官,都“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¹³⁾,贵州田、宋二官统治湖南地区恐始此役。

至元十七年,彝苗等族农奴等人反元,是贵州最早反元起义,揭开了贵州反抗元廷流土官斗争序幕。从此以后,贵州各族此起彼伏的斗争,最后与全国反元大起义汇合,埋葬了元王朝。

贵州各族反元反土官的斗争,可分为四期,前期特点是起义规模小,此起彼伏,各处农奴等人在起义中没有多大联系,分散在各个土官庄莊园里进行。后期起义规模大,一处地方发生起义,很快有多处地方起义响应,并形成各族联合斗争,起义地区宽广,力量强大,给元王朝的打击最沉重。

一 元初农奴斗争

我们从《土司社会的赋税和劳役》一节中知道流土官对农奴等人压迫剥削非常残酷,人民生活在无边苦海中;各地元军经常抢劫与俘掠人口等罪恶活动;土官与流官的明争暗斗;土官之间的兼并仇杀,成千上万农奴等人死于非命。这是元代贵州农奴等人起义多的原因。

1. 至元二十至二二年,“时思播以南”的施黔鼎澧辰沅等州“叛服不常”(《元史·李忽兰吉传》),即湘鄂川黔边区苗、土家、仡佬等族经常出现反抗元朝残暴统治。这个地区群众根据山区特点,凭借山高林密,谷深箐大,溪流交纵的有利地形伏击元官兵。各族分散在各地打击元统治者,元官兵人少势弱,人生地不熟,加上水土气候不适应,处于“冒烟瘴”被动挨打。元廷为改变被动挨打局面,集重兵加以镇压,“以参政奇尔济苏(别作曲里志

思或曲立吉思)、左丞汪惟正一军出黔中(彭水),签省巴图(别作巴八)出思播,都元帅托察一军出澧州南道,宣慰使李呼哩雅济(又作李忽兰吉)出夔门会合”。诸族虽然“设伏险隘、木弩、竹矢伺间窃发,亡命迎敌”,以抗元军。然众寡不敌,元军“凿山开道,分兵并进”,步步深入,许多起义者“多就擒戮”,酋长力屈出降,起义失败。

元廷平定湘鄂川黔边区之后,据所招降首领、头目等人占有农奴等人数目和土地大小,分别设立蛮夷总管府、州(保靖、来化等)、县及长官司,俱“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以曾“赴阙”回来“酋长”任各级土官。这些“酋长”现在成了元朝地方官,继续占有土地人民,成了辖区最高统治者,只有人民倒大霉,无辜死去成孤魂野鬼,幸存者继续受罪,当牛做马⁽¹⁴⁾。

2. 至元二七年七月,贵州(贵阳市、开阳、修文、息峰、广顺、龙里)的苗侗族反抗贪官污吏,“以三千人”首起,发展很快,短期内形成强大力量,超过元军在“贵州”势力,集全力攻打“顺元城”。苗侗农奴等人目标明确,“劫顺元路,入其城(贵阳市),遂攻阿牙寨(在开阳),杀伤官吏”。这个胜利予各族很大鼓舞,以贵阳为中心民众都积极响应,“其众遂盛”。中心开花的起义成功,使元朝在贵州统治全面动摇,元在顺元路的政权被捣毁,元残兵无力与义军抗衡,“湖广省檄八番、均州二万户府及八番罗甸宣慰司(惠水、平塘、罗甸、长顺、紫云、安顺)合兵讨之”。元廷用蒙汉和八番金竹等土官兵进剿,才把起义平息,恢复顺元路统治,又在一些地方设州县及长官司,“长官、总把参用土人”⁽¹⁵⁾。

3. 至元二八年八月,思州宣抚司辖的提溪、省溪(即今江口县)的农奴等人反流土官。元廷予各处起义应接不暇,对只有两个长官司范围的起义没有派兵去镇压,只谕“苗官杨都要”,“招抚叛蛮”。“苗官杨都要”向本族起义者宣布“悔过来归者”,既往